

《百年包玉刚》之二

我与包氏家族的渊源

(一)

我外婆家是当年镇海县压赛堰三斛李家(现江北区)，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外婆共生育三个女儿，我大姨、二姨和我妈。外婆在妈妈 14 岁时去世了，外公在我出生的第二年 (1959 年)也过世了，外公和外婆在我孩提时代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听大姨说，外公是领风气之先的，在上个世纪 30—40 年代就在舟山的衢山岛开办鱼货工厂，那时候外公带回家的咸干海鲜吃不完。我懂事以后就知道妈妈一直不愿吃海蜇，说小时候吃怕了。2015 年我与二个表兄弟一起去衢山岛为寻根祭祖，几经周折找到一知情老人，他称外公为“穿长衫戴眼镜的笑面先生”，还兴致勃勃带路去外公的鱼货工厂旧址查看。

出生于大户人家的我妈、大姨、二姨三千金在当地十里八乡也小有名气。1946 年我二姨李美玉与包玉刚夫人弟弟黄均乾喜结连理，我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住在上海长乐路 1040 弄，那里是花园洋房，隔墙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华山医院。

1971 年文革极左岁月，我 1941 年就参加新四军的老父亲被打成叛徒、特务，我成了黑帮子女。为避灾，暑期妈妈送我到二姨家，那年我 14 岁。二姨家住二楼，记得有二大间一小间，卫生间里还有当年极为稀罕的浴缸、抽水马桶等。我在那里享受了亲情的伟大，留下满满的童年美好记忆。

我二姨爹妈妈，也就是包玉刚的丈母娘就住在那小间里，我表兄弟姐妹们都叫阿娘，我也跟着叫阿娘。阿娘面慈目善、脸色白净，那时候走起路来已经颤颤巍巍，我们朝夕相处，老小无猜，其乐融融。再后来，包玉刚的事业发达了，我二姨全家都去了香港，姨爹黄均乾成了包玉刚环球航运集团的核心层人物，主管财务。

（二）

大概八十年代初，香港的大表姐打电话委托我代为办理其爷爷黄鉴湘迁建坟一事，我和表哥一起骑自行车去 20 多公里外的东钱湖象坎村，几经奔波顺利在东钱湖华侨公墓完成委办事宜，包家也甚是满意。1988 年包夫人回乡，我还与市侨办等领导一起陪同前往扫墓。1988 年包玉刚夫人黄秀英女士及其胞弟黄均乾先生捐资 100 万港币，在他们出生地附近的天封卫生院建成黄鉴湘门诊楼。

我与包氏家族企业真正擦肩而过的是 1990 年左右，当时包玉刚的第四女婿郑维键（新加坡）在宁波搞了一个恒健企业，把现在梅墟一带土地统统拿下，还把宁波罐头食品厂等一批企业吃下，准备要大显身手了。企业扩张，急需本土人才，不知怎的就看上我了，记得宁波项目主管（新加坡人）还摸黑来到我家里，征询我的意见，再三劝我加盟恒健，并说可以找葛洪升省长来调我。当时我在电视台工作顺风顺水，加上我对土地开发外行，婉拒了。可惜的是，当时经济大气候和恒健企业水土不服，眼光不

长远，二三年后由宁波政府出资回购了，后来那里搞了一个宁波科技园区（现在叫高新区）。这是包氏家族企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投资宁波，现在我想起来还耿耿于怀，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劝他们再坚持一下呢？最近看的一条微信很有意思，一个法国小伙拿了 300 万来上海发展，100 万按揭了一套房，200 万投资红酒产业，结果十年后，法国小伙红酒产业彻底玩完了，他无奈把房子卖了，拿着 1300 余万回国了。结论是：中国真是是个奇葩的国度。

（三）

我平生最大遗憾就是有了一个伟大的构想，没有付诸实施。1984 年 8 月 1 日小平同志发出动员全世界宁波帮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后，宁波掀起改革开放建设的高潮。大概是 86 至 87 年，我的电视台记者身份，有机会接触上层，当时电视台急需造大楼、电视塔，就此我萌生一个大胆想法，就是利用包氏家族雄厚实力，在宁波三江口搞一个三江环岛项目，大致计划是包氏家族出资，市政府用汽车过路过桥附加费和电视台广告收入等资源担保投资收益。记得当年江厦桥还是浮桥，如果用一个大环岛，把海曙、江东、江北连起来，汽车上环岛，老三区任行，环岛中间造一座宁波地标建筑----三江口电视塔，具备观光功能。当时我以为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包先生还能在家乡获得永恒的口碑。我当年还曾为此激动的睡不着觉，还与规划、建筑设计院朋友探讨过。

当时实际情况是到处都缺钱，关键是能找到上亿元大资金。

记得 1988 年金秋趁姨爹随包玉刚一起回家乡之际，我曾试探性把想法说了一下，姨爹说，这个项目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有没有项目可行性研究，资金如何运作等等一系列问题。我被问倒了，毕竟我还处于构想阶段，没有好好论证。随后，全国性的政治风波以及我因故离开了电视台，这个构想胎死腹中，抱憾终身。